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迎来而立之年。岁末,新的太空征程在冬日里昂首启航。神舟十五号发射升空之际,我的长篇报告文学《逐梦太空——中国载人航天之路》也出版了。作为一名20多年来持续关注 and 书写中国航天的老作者,我深感欣慰和光荣。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大学毕业后来到曾经创造“两弹一星”伟业和航天辉煌成就的国防科技战线。因为工作关系,我得以走近托举“神舟”的发射场,走近梦圆凯旋的着陆场,走近隐姓埋名的科学家,走近坚毅勇敢的航天员……他们用智慧和心血在茫茫太空铭刻下了执着专一、淡泊名利、心无杂念、坚韧顽强的精神丰碑。与此同时,有一个词语在我心里日渐清晰起来,那就是梦想。中华民族是最早萌发飞天梦想的民族,航天工作者毕生追求的航天梦彰显着民族精神的底色。

投身于文学,虽然是个人的志向和事业,但为时代书写却是作家应有的担当。值得我一生铭记的是,10年前的一个桃花盛开的春天,为纪念载人航天工程实施20周年,我在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中担任总撰稿。在长达3年的拍摄过程中,我走进工程的各大系统,来到创业者和实践者们的身边,有幸陪着他们的人生和梦想,追寻他们独特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内涵。尽管电视片中可能只出现他们的一个镜头,只有几秒的同期声,但无论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无论是专家院士,还是部长将军,都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尽的故事。从他们饱含深情的回忆、噙着热泪的讲述,充满自豪的笑声,我知道中国的载人航天走过的是怎样一条艰苦卓绝的飞天之路,明白了他们的壮举牵动着多少人对外层空间的执着探索。言谈话语之间,我深深感受着他们为祖国尊严和民族复兴而付出的智慧和辛劳。与此同时,我还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自己的科学良知与责任担当去推动事业的进步。他们有过幸福,有过迷茫,有过痛苦,有过期盼,但自从加入航天员队伍之后,就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命运、个人的期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他们前赴后继、砥砺前行,用智慧和心血谱写的时代壮歌,推动我们这个航天大国一步步迈向了航天强国。

辉煌的事业、崇高的精神、可敬的人物,不断地冲击着我、感染着我、打动着我,用文学的形式记录感动天地的壮举,用文化的力量去还原鲜为人知的往事的想法萌生了。那部纪录片拍摄结束后不久,我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采访创作。

载人航天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我国在这方面虽然起步较晚,但因为有了一批执着的圆梦者,始终坚持高起点自主创新,奋力攻关,突破和掌握了一批核心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跨越式发展道路。辉煌成就的背后,科学家和航天人的工作常常是孤独寂寞、淡而无味的,但正是这样的矢志不渝,创造出顶天立

用文学记录飞天梦

■兰宁远

地、震撼千秋的伟业。

写作者最大的苦恼是内心最深切的感悟却难以用文字充分表达,一表述就很容易把深刻的感悟简单化或肤浅化。航天员张陆出征前曾道出“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的心声。作为书写航天故事的作家,提笔写下第一行字时,又应该带着怎样的目标呢?虽然很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讲给读者,然而,当我面对着一份份沉甸甸的资料,真正下笔开始创作时,我感受到的却是艰难。

载人航天工程涉及面之广,史无前例,令人震撼。我该写什么?怎么写?我记得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曾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文艺创作不光说成就,也应该讲讲挫折,让大家知道中国走过的这条飞天之路,其实是挺不容易的。”的确,只有最泥泞的道路,才能留下最深的足迹。像载人航天这么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一路走来怎么没有坎坷和曲折呢?恰恰是这些与成功相伴的“不顺”,折射出航天人的科学精神与情怀大爱。30年来,漫漫征途中,迢迢天路上,他们就像一个苦苦追寻的“行者”,不停地翻过座座高山,蹿过条条大河。

我在写作时总想着王永志总设计师的话,决心把工程的全貌真实客观地呈现出来,既反映工程研制的主要场景,讲工程取得的成绩,也呈现研制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努力让文化化作飞天路上的优美和声,尽可能地充满感动和力量。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们感受和理解科学家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担当和科学情怀,在写作《逐梦太空》时,我除了用朴实的文字、翔实的内容写好人物、讲好故事之外,特意在叙事过程中增加了一些科普的内容。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还找来一百多幅精美的图片,相得益彰地融在文字之中,这样就能通过诗意的表达和形象的解读,让读者朋友在振奋和愉悦中收获知识、感动和思考。

《逐梦太空——中国载人航天之路》出版时,冬天刚刚到来,火箭腾飞的烈焰给正在与疫情抗争的人们带去了更多温情和信心。一本书只是一块小小的铺路石,通天大道上还有更新更美的故事等着我们去记录、去讲述。正如邓清明出征前所说的那样,这个伟大的新时代给了我们奋斗圆梦的广阔平台,能够被祖国需要就是最幸福的。同样于我而言,用文学的力量逐梦九天,只要读者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

传统赓续与时代拓新

——关于新时代军旅散文笔谈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侯健飞:文体裁是创作主体长期实践的产物,反过来又受实践的检验。在文学的诸种体裁中,散文无疑扮演着源头和母体性质的角色。散文覆盖了除诗歌以外的、非韵文的文字作品,某种意义上甚至包括了哲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内容。

军旅散文在中国文学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左传》中许多篇章,用极其简略的语言就描摹出一场战争,或分析军事谋略,或再现战争场面,或塑造形象,或表达思想,无不高屋建瓴,镜鉴后世。比如《孙子兵法》,如果仅仅把它当作一部兵书对待而忽略其文学和艺术审美层面的价值,这是不全面的。

古人有“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之说。中国现代文学史发端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抒情、政论性散文有如匕首和投枪,挣脱和冲破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有力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五四”前后,金戈铁马、波涛汹涌的文学雄风,成为警世的黄钟大吕,在漫漫黑夜中振聋发聩,唤起民族奋起的伟大心声。

军旅散文具有“真情”“载实”和“战斗”的特征,在中国革命军事斗争中发挥了“百万雄兵”的威力,在特殊时期的战场上,也成为最灵活有效的“武器”。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同时也是散文家。“革命召他以实践,战斗假他以文章”。先拿笔杆子后拿枪杆子的毛泽东,一生都在践行文韬武略。1912年,19岁的他挥笔写就读史心得《商鞅徙木立信论》。短笔孤灯,长江大河,从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直至后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胸怀神州,放眼世界,纵横捭阖,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彰显文章“载实”以传情达意的风范。

毛泽东自己写文章,也提倡并指导官兵写文章。《红军长征记》这部散文集的创作,当属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集体创作的“开先河之作”,也是毛泽东高度重视文学战斗作用的一个实例。

红一方面军刚到陕北,毛泽东就指示杨尚昆在政治部成立编辑委员会,并亲自起草征稿信,号召参加长征的师团以上干部把“战斗经历、民情风俗、奇闻

轶事……择其精彩有趣的片断”写出来。1936年11月22日,在陕西保安,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言说:“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

《红军长征记》(原名《二万五千里》)在1937年2月由丁玲主编完成,分上下两册,近50万字。董必武、徐特立等一百多位长征亲历者真情回顾了长征途中的点滴故事。编者在《关于编辑经过说明》里写道:“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做文章的人,他们能粗糙质朴地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单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然而,考虑到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编好的书只油印20套,没有对外发行,其中一套由朱德总司令签赠给了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部珍贵的散文集也成了斯诺撰写《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第一手材料。1942年,红军总政治部把《二万五千里》更名为《红军长征记》,少量印刷作为内部参考。60多年后的2002年,有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发现朱德总司令赠给斯诺的签名本《二万五千里》孤本。2006年之后,国内先后出版了《红军长征记》几个版本及解读,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一些文化学者认为此著不仅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史学价值、军事史学价值、历史文献价值和文艺史学价值,而且是一个民族精神特质的写照,也是人民军队文化肌体由弱变强的开端。与此同时,中译本《西行漫记》在国内已累计发行上千万册。《西行漫记》1938年出版中译本,之后的五六年间,众多青年学子因为读了这部书,而纷纷奔赴红色延安,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红军长征记》,就不会有如此样貌的《西行漫记》,而后者对中国共产党和地领导人的人民军队在国际上产生的巨大影响,非常值得研究。《西行漫记》在创作手法上也别具一格,是非虚构文学创作理论在中国的较早实践。如果大多数读者认为《西行漫记》是报告文学,我个人更倾向将其归类为纪实散文。散文并不排斥情节和人物,人物和情节不追求表面的完整,服从于情思的脉络。《西行漫记》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众多人物,着墨并不多,却极尽画龙点睛之妙。

毫无疑问,由《红军长征记》到《西行漫记》的创作和出版发行,深刻建构

了人民军队在海内外的声誉和文化品格。为纪念建军35周年,在《红军长征记》的基础上,大型军事纪实散文征文活动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书名:《星火燎原》。时至今日,《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这两套丛书,已成为彰显人民军队文化实力的经典史诗。

军旅散文以其真情、真实、短小和灵活的特质,一直伴随着人民军队的战斗和壮大历程,是“人民军队为人民”精神内核的重要宣传力量。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巍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不仅及时写出了志愿军感动天地的英勇事迹,而且创造了子弟兵的代名词——最可爱的人。抗美援朝战争催生的军旅散文经典还有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萧军的《从上海归来》,史卓民的《十八列火车》,刘白羽的《英雄城——平壤》等。这些作品所写的人物、事迹壮怀激烈,撼人心魄……

进入新时期,军旅散文创作从此前的低谷状态走了出来。毛岸青、邵华的《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曹清华的《红岩归来》、胡可的《怀念侯金镜同志》等一大批“还历史真面目”的散文问世。之后十多年间,军旅散文创作紧随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脚步步入正轨,佳作名篇不断涌现。如彭荆风的《驿路梨花》、陈学犁的《奔腾急》、张为的《哨所》、高洪波的《边陲红雨》、石英的《对竞争对手的怀念》等。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之初,中国文化掀起了一股散文热潮。军旅散文创作也迎来一个黄金时期。除军旅散文家刘白羽、徐怀中、顾工、碧野、邓友梅、王宗仁、杨闻宇等已成嘴炙,一些著名的军旅小说家、诗人也纷纷加入散文创作行列,如朱苏进、李存葆、周涛、庞天舒、海燕、朱秀海、徐贵祥、袁山山、杨献平、张春燕、王族等,其中周涛的《蠕动的屋脊》和海燕的《女人独自上路》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军旅散文创作虽然依然葆有一定数量,但是质量和影响力均不容乐观。略显可观的大都是名家旧作,真正跟踪书写、反映新时代军旅生活的现实题材散文作品数量较少、质量平平,作品无法引起评论家和专业研究者的关注,也难以获得稳定的出版资源,更遑论赢得广大读者的青睐。解决军旅散文的创作问题,首要的在于,创作主体应植根于军事文化厚重丰饶的土壤,自觉赓续优秀的历史传统与审美品格。树立起这个鲜明导向,军旅散文创作的道路才会持续走宽。

杨献平:作为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

刚健既实 辉光乃新

■杨婷婷

是杨宏写作《军旅戏剧影视形体表演教学研究》的初衷。这本书也是杨宏长期教学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的成果总结。

一是要有“信念”。作者介绍了传统戏曲“四功五法”中的“五法”,即“手、眼、身、法、步”;并特别指出系统的眼神训练能够使“人物有了灵魂”。一些银幕上的军人形象,光凭眼神就深深铭刻在了广大观众心中。比如《英雄儿女》中田方饰演的王文清,特写中的双眼炯炯有神,把军人的坚毅和父爱的慈祥表现得那样深邃。这既是演员“传神”之作,也是整部电影的神来之笔;除了情绪表达,“眼功”的效力也格外光彩夺目。

《军旅戏剧影视形体表演教学研究》中沉淀着几代军旅戏剧教育工作者的甘苦和奉献,其成果体现在众多军旅戏剧影视表演艺术家为中国当代戏剧影视塑造出的不朽人群像上。当下,部队文艺“为兵服务”的职能被更多地赋予了“文艺轻骑队”。新时代的“文艺轻骑队”队员们要履行好使命,就需要具备出色的舞台表现能力,需要在形体表演上下一番功夫。歌唱、舞蹈、小品、朗诵、主持等,都需要演员具备展现最美军人形象的形体表演能力。用古人的话说,这是给艺术形象注入“风骨”,也即《文心雕龙》中所讲的“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因此,这部研究军旅戏剧影视形体表演的专著为新时代的强军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助益,也为“文艺轻骑队”更好地为兵服务提供了经验和理论支撑。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创

下坚实基础。

三是会“传神”。在军人形象塑造上融入戏曲重视“传神”的观念和技巧是大有益处的。本书介绍了传统戏曲“四功五法”中的“五法”,即“手、眼、身、法、步”;并特别指出系统的眼神训练能够使“人物有了灵魂”。一些银幕上的军人形象,光凭眼神就深深铭刻在了广大观众心中。比如《英雄儿女》中田方饰演的王文清,特写中的双眼炯炯有神,把军人的坚毅和父爱的慈祥表现得那样深邃。这既是演员“传神”之作,也是整部电影的神来之笔;除了情绪表达,“眼功”的效力也格外光彩夺目。

《军旅戏剧影视形体表演教学研究》中沉淀着几代军旅戏剧教育工作者的甘苦和奉献,其成果体现在众多军旅戏剧影视表演艺术家为中国当代戏剧影视塑造出的不朽人群像上。当下,部队文艺“为兵服务”的职能被更多地赋予了“文艺轻骑队”。新时代的“文艺轻骑队”队员们要履行好使命,就需要具备出色的舞台表现能力,需要在形体表演上下一番功夫。歌唱、舞蹈、小品、朗诵、主持等,都需要演员具备展现最美军人形象的形体表演能力。用古人的话说,这是给艺术形象注入“风骨”,也即《文心雕龙》中所讲的“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因此,这部研究军旅戏剧影视形体表演的专著为新时代的强军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助益,也为“文艺轻骑队”更好地为兵服务提供了经验和理论支撑。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创



长征

第5660期



水兵的礼节(油画)

周朴田作